

■ 文章编号: 1005-9652(2011)01-0023-02 中图分类号: G270.9 文献标识码: A 关键词: 六经, 历史, 章学诚

■ Discussion on "Six Classics Are History" —— Misapprehension on Zhang Xuecheng by Archival World (WU Jing-yan, Archiv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 Keywords: Six Classics; history; Zhang Xuecheng ■ 收稿日期: 2010-11-14

再谈“六经皆史”

——关于档案学界对章学诚的一个误解

吴静研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北京 100872)

Abstract: Zhang Xuecheng, in most of his life, compiled and wrote local records and put forward many new ideas in the theory on local records. As an archival scientist in real sense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prefecture and the county should established local records", and is the theoretical pioneer in establishing the local archives. His famous words that "six classics are history" are not fit exactly to the archival theory, so we need not require it strictly.

摘要: 章学诚一生多修方志, 在方志学理论上多所创获, 其中所提出的“州县请立志科”, 的确可以看作建立现代地方档案馆的理论先驱, 档案学家之桂冠并非虚名。但他最著名的“六经皆史”一论, 并不能和档案理论若合符节、衔接顺利。我们今天的档案学理论, 不必对此求之过深、强溯其源。

档案学界一般公认给章学诚一项“档案学家”的桂冠, 更已有多人撰文讨论章氏对档案学理论的贡献, 其中, “六经皆史”几乎是必谈的一项。一般以为, 章氏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扩大了档案史料的范围, 可以看做是今天档案收集与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此命题其实内涵暗昧、背景复杂, 为学界争论已久, 是否可以档案学理论所用, 实可商榷。这里试将学者对此命题理解的历史稍加梳理, 借以澄清档案学界对章学诚的地位与贡献问题的一个误解。

章学诚, 字实斋, 号少岩, 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中期学者。章氏一生以史学自矜, 所作大部分文章, 汇集成《文史通义》一书, 欲成一家言。《通义》自有体系, 然而对当时学术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死后二百余年, 其著作被日人内藤湖南氏及胡适等人重新抉发阐释, 终得以史家名世, “六经皆史”之论, 遂天下皆知。胡适说: “六经皆史也, 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1] 自胡适以来, 续有学者风从, 以为章氏提出此论, 意在把包括六经在内的所有文字记录, 都视为史料。档案学界往往径袭此种说法, 遂有“扩大史料范围”之论^[2]。但关于“六经皆史”说的内涵和意义, 其实早有学者对“史料说”提出质疑, 下面简略做一梳理。

一、“六经皆史”之“史”

六经皆史的命题, 首先出自《文史通义》全书公认的首篇《易教上》: “六经, 皆史也。古人不著书,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依胡适之说, 此“史”即为史料。学者并进一步拈出“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报孙渊如书》)一语为证, 以为章氏之说即合于现代史学家的史料观, 甚至引申出, 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 都可以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因此, 对此说进行探源性研究的学者, 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史”字的含义, 试图澄清“史料”论者对章氏一定意义上“以今推古”的误读。

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钱穆:

“(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 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 都看错了。……梁任公曾说: 卖猪肉铺柜上的账簿也可作史料, 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史释》, 正是解释这个史字。……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 如我们说现在教育部、外交部多存有许

多档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职官必须时时翻阅的,此等档案叫做‘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史’。”^[3]

钱穆之说抽丝剥茧,将这个“史”字解释得非常清楚。但“史”的含义虽然近于今之档案,却也不能据此就得出“六经皆档案”的结论。这涉及章学诚本身对“经”与“史”的看法,还需进一步澄清。

二、“事”与“道”:政典是什么

仅视“政典”为档案,则由“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可以推出“六经是档案,档案是史,故六经是史”的结论,不免忽略了章氏本身所特重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就是“事”与“理”(“道”)的关系。事实上章氏于“道”特重,曾反复论述所谓“史”与“政典”都不过是载道之“器”,道器本不可分。因此对“六经皆史”涵义的合理解读,就如汪荣祖所概括的:

“实斋认为六经之所以皆史,因都是先王的政典,也就是说古时候只有史而没有经;经是后来因‘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但是六经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记录,更非普通的史料,而是掌在官府的先王政典,由‘有德位’之人,用之以‘纲维天下’,绝非私人的著述,‘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4]

三、“记注”与“撰述”:对“史”的再认识

《文史通义·书教下》有一段著名论述: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这里提出的“记注”与“撰述”的两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六经皆史”之“史”的另一个层面。章氏曾指出,“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记注有成法,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书教上》)。记注的目的在于“欲往事之不忘”,所以应该力求“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靠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这些档案被分类整理,以便于保存和查阅。然而,尽管“道”就在这些档案之中,但由于“史守掌故而不知择”,这些档案的意义和功能还无法发挥出来。这也可以看做是“六经皆史”在档案层面上的意义。但六经并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可以经过有德位之人“推论精微”,揭示出内含于其中的道。此即所谓“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守其法”(《史释》)。这种道器合一的“典籍”,才是具有无穷功用的“政典”,才是章学诚心目中真正的“史”,“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5]。

四、“六经皆史”探源:理论是否有独创性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曾论及“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后更有学者将章氏之前曾论经即史者一一列举。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守仁的“五经亦史”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6]

据上文论述可知,章氏曾反复揭示器道合一、即器明道之旨,实与王氏之论无异。“六经皆史”之“史”既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就不能简单以档案目之。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虽然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更深入和明确的发挥,然而远远没有超越时代的限制,并未接近现代史学家的史料观点。因此,以史料为指归的现代档案理论,也难以从这个著名论点中找到直接的理论渊源。

五、结论

章学诚一生多修方志,在方志学理论上多所创获,其中所提出的“州县请立志科”,的确可以看作建立现代地方档案馆的理论先驱,档案学家之桂冠并非虚名。但他最著名的“六经皆史”一论,并不能和档案学理论若合符节、衔接顺利。我们今天的档案学理论,不必对此求之过深、强溯其源。

参考文献:

1.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2. 高寿仙《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3.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4. 纪大元《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1。
5. 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7. 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参考文献:

- [1] 胡适. 章实斋先生年谱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105-106.
- [2] 纪大元.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 [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9.1.
- [3]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4] 汪荣祖. 史学九章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235.
- [5] 高寿仙.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J]. 北方论丛, 1997 (05).
- [6]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上 [M].